

# 馮翠屏「高效體系」+「文化內涵」 拓港隴旅遊深度合作

自2008年受聘加入甘肅省政協至今，香港廣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馮翠屏已是內陸省份資深的港澳政協委員。多年來，她致力於對甘肅的捐助、援建，為甘肅創造招商引資機遇，不斷挖掘合作契機。今年，馮翠屏又遞交了《關於加快甘肅旅遊產業發展的提案》，建議將香港對旅遊內涵的深度挖掘、高效的組織體系與甘肅旅遊的深厚文化內涵、優美自然風光相結合，抓住「一帶一路」機遇，整合資源、深度合作，將甘肅旅遊推廣至全世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剛、李曉華 蘭州報道



馮翠屏在甘肅兩會小組討論中發言。 記者肖剛攝

說，旅遊業因其資源消耗低、帶動系數大、就業機會多、綜合效益好，作為戰略性產業，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有效途徑。

### 提服務質量 促文化交流

馮翠屏建議，甘肅應借鑒香港優質的服務經驗，「加強與香港的業務培訓、認證合作，進一步促進兩地旅遊業的互聯互通，尋找文化、餐飲領域的合作商機，盡快建立專業旅遊協作體系，完善顧客對旅遊服務質量的投訴機制，充分發揮旅遊行業協會組織的特殊作用。」

還應強化人才的培訓與引進，建立文化人才信息網和交流平台，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密切交流，引進文化旅遊高級經營管理人才，並創新獎勵機制，廣泛吸引國內外知名藝術家、經紀人、企業家赴甘肅創業。打破對資源的過度依賴，尋找新出路。

### 擴大專業資格互認範圍

同時，建議容許香港服務業進入甘肅，擴大更多專業資格互認範圍，並在不同領域開放對港資的准入條件，拓寬金融合作，發展「一帶一路」旅遊經濟帶，利用香港將絲路特色旅遊文化推廣至全世界。

馮翠屏表示，香港回歸以來，兩岸文化交流愈發頻繁，但許多香港青年對於中國歷史文化依然知之甚少，如為香港學生開展以「絲綢之路探索之旅」為題的研學旅行，讓香港青年學生通過在甘肅參觀、考察和學習，進一步了解古絲綢之路的歷史與文化，了解「一帶一路」戰略對內地、香港乃至全球的影響和意義，必將增強香港青年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馮翠屏(右)參與維港獅子會驗眼活動。 網上圖片

## 破交通瓶頸 擴在港推介

馮翠屏告訴記者，制約甘肅旅遊發展的首要因素是交通，完善旅遊交通體系會極大改善遊客的出行體驗。「香港作為許多國際航班的中轉站，是打開境外市場的重要樞紐，但敦煌至香港定期往返航班只有每兩周一班，如果增加班次，將大大提高國際旅客來甘肅旅遊的熱情。」而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重要節點城市、國內

重要城市間也應開通直航航線，並適時增加班次。

「打造以蘭州為中心的國際化、現代化鐵路綜合交通中心，構建蘭州、白銀、武威、金昌、張掖、定西、天水等城市同城化格局」也是馮翠屏提案的亮點之一。

多年行走甘肅的所見所聞讓馮翠屏認識到，甘肅文化旅遊內涵的挖掘，應借

助現代化、藝術化、科技化手段，將厚重文化資源轉化為遊客喜聞樂見，具備主題性、趣味性、和諧性的旅遊產品，重點開發大型旅遊演藝精品類富有地方文化特色、雅俗共賞的娛樂節目，因地制宜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鄉村文化旅遊，多管齊下，讓甘肅的文化旅遊品牌發光發亮，踏上新台階。



甘肅省蘭州市安寧區入選「亞洲旅遊業金獎」。 網上圖片



## 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

### 回顧「七君子事件」

全國工商聯的成立，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人民政協組成單位演變的一件大事。與全國工商聯的誕生相對的，是中國人民救國會在建國之初的解散。

中國人民救國會的前身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抗日運動風起雲湧。其中，上海更因其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與北平遙相呼應，成為抗日宣傳與發力的重鎮。鄒韜奮、胡愈之、杜重遠、沈雁冰、李公樸、沙千里等名士先後創辦了《生活》、《新生》、《大眾生活》、《婦女生活》、《讀書生活》、《生活知識》等刊



「七君子事件」。 資料圖片

物，宣傳抗日主張。1935年華北事變爆發，中日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上海各界愛國人士紛紛成立救亡組織，上海婦女救國會、文化界救國會、教授救國會、電影界救國會、職業界救國會、學生界救國會、新聞界救國會等組織於1935年底密集成立。在此基礎上，為了加強各救國團體的團結合作，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936年1月28日成立，公推沈鈞儒為主席，章乃器、李公樸、陶行知、鄒韜奮、王造時、史良、沈體蘭、沈雁冰、潘振亞和沙千里為執行委員。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也分別成立了各種抗日救亡的群眾團體，也多取名為救國會，如華北學生救國會、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等。1936年春夏，在日軍侵略下，華北五省已名存實亡。為切實強化聯合，集中力量發揮更大作用，全國18個省60多個救國團體的50多名代表以及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和十九路軍的代表，於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開大會，宣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綱領和抗日主張。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之後，又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會。各國華僑也紛紛響應，成立了全歐救國聯合會等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會，成為了一個全國性的體系完備、步調一致的重要群眾團體和



1936年5月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圖為救國會領導人(前排左起)沈鈞儒、史良、王造時、沙千里等參加上海各界群眾的抗日愛國示威遊行。 資料圖片

政治組織。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使分散的民間抗日力量迅速凝聚起來，在推動救亡圖存、國共合作等方面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也招致蔣介石的強烈不滿。特別是1936年10月19日，偉大的文化戰士魯迅先生逝世之後，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等全救會領導人率各界萬餘人，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為魯迅先生送葬，繼而演變為抗日大遊行，更是直接觸痛了國民黨的短處與痛處。11月22日夜，國民政府在上海突然逮捕了全救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七人，史稱「七君子事件」。「七君子」被捕，舉國震駭。全國各地救國團體和各界人士紛紛發表通電或聲明，抗議政府的反動行徑。不僅宋慶齡等全救會領袖通電譴責，而且連于右任、孫科、馮玉祥、李烈鈞等國民黨上層人士也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對此事件慎重處理，並發起10萬人簽名營救行動。李宗仁、白崇禧等軍人也致電蔣介石，要求無條件釋放。但是，蔣介石為了徹底控制時局，扭轉被動局面，一意孤行，堅決不予釋放，並羅織罪名對全救會七領袖予以起訴。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對諸愛國領袖予以聲援。

在輿論壓力不足以動搖蔣介石頑固立場的情況下，

宋慶齡等於1937年7月5日親赴蘇州「投案」，要求蔣介石以同罪名逮捕自己。各方面政治、輿論壓力日益加重，兼之中日全面戰爭已經爆發，國民政府被迫於7月31日釋放了「七君子」。歷時半年有餘的「七君子事件」，進一步喚醒了全國人民的團結抗日、一致對外意識，進一步打擊了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光輝意義永銘青史。

全救會在抗日戰爭期間，始終發揮着重要的號召和推動作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為了進一步促進國內和平建設與民主政治的發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945年10月在重慶召開大會，決定更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宗旨是「團結國人，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民主新中國」，沈鈞儒再次被推舉為主席。《中國人民救國會政治綱領》明確指出，「現階段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它不是停留在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而是經由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

救國會與中國共產黨政治主張基本一致，在國共鬥爭的歷史時期，在中國前途的抉擇時刻，旗幟鮮明地站在了中共的一方，成為其後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籌備單位之一。